

15.02

胶州文史资料

第七辑



胶州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省胶州市委员会

1993年2月

胶州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胶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潍坊华光集团公司激光排版实验印刷厂排版

胶州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5.75 印张 14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青岛市新闻出版局(93)17 号

2A40/22
审 定：张德秀 曲长礼 唐功谦

编 辑：冷增璧 汤筱林 石业华

校 对：任太美

目 录

回忆刘风扬	雷 赤 (1)
战时的机关生活	仲兆峰 (4)
回忆建国前的粮食工作	于式源 (9)
身立敌课堂 勇教革命书	王秀峰 (13)
浴血搏火战沽浜	
——沙梁阻击战散记	蔡世宝 仲伟官 (16)
胶东站夺枪始末	王甫良口述 王宝琪整理 (22)
解放战争时期儿童团的活动	胡金台 (28)
建国前胶州饮食服务业概况	宋保业口述 宋雅丽整理 (30)
前进的旗帜	
——记管相云农业合作社	孙忠先 (39)
利民火柴合作社始末	吴 斌 (44)
苏家面店	匡 炯 孙忠先 (49)
小麻湾河口	陈竞雄 (53)
两宋时期的板桥港口	石业华 (58)
胶州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周存信 (66)
营房镇沿海几处要地	刘世远 (73)
赵毓检回乡办学	赵庆云 (76)
忆胶中任职时期的父亲——王少岑	王慕正 (83)
回忆胶州大生堂德记药店	高维仪 (86)
胶州市养生学考略	王立德 (92)

胶州工艺美术概览	臧 苏(95)
艺林垂范启来人	
——缅怀杨仲原先生	李重修(106)
近代胶州几位民间艺人	李宗浩(114)
濒临失传的胶州秧歌	李志大(116)
莒国古城初探	高祀祖(120)
高凤翰籍贯及生卒年考	石业华(124)
谈胶州发现的齐币	廉福银(127)
麻雀撞竹屏	
——宋孝真跟郑板桥赛画的故事	
..... 张瀚绪口述 周恩惠整理	(129)
胶州旧时婚丧礼俗	王建亭(132)
胶州真武庙会与登城春游	王朴诚(138)
昔日胶州内城	仲兆峰口述 臧家健整理(141)
麻湾渔乐	王呈五(146)
麻湾桥	张子明(151)
大刀会在杜村一带的活动	高森绪 杨进科(155)
王子明血洗法家庄	刘 群(160)
古代妇女四悲	郭从仁(162)
胶州罕见的雷击事件	叶永安(165)
根据地的歌(续)	宫天豫(169)
读者来信	王学斌(177)

回 忆 刘 风 扬

雷 赤

我叫雷莲馥，参加革命后，经刘风扬同志建议改称雷赤。在革命战争时期，为避免敌人搜捕，又称雷阵玉。

我家原住胶城大十字口街，后搬迁到袁家巷，距刘风扬同志的家很近。风扬的妹妹风霄常来我家，俺俩经常在一起做针线活、聊天。时间一长，逐渐结识了风扬同志。在风扬同志的启发和开导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于是，由风扬同志介绍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经常替风扬同志送信、送情报，帮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刘风扬同志活动的场所是南坦南菜园内的三间茅屋，他们经常在这里以娱乐为名，进行秘密活动。我也经常与风扬同志一起参加活动。不料，在一天傍晚，风扬同志突然被捕入狱。

风扬同志被捕入狱的经过是这样的。起初，我们接到党的地下工作者刘冰爱人的来信，说刘冰同志已经被捕，让风扬同志赶快转移。风扬同志见信后，本想马上离开胶县，可是，刚走不远就扭了脚，不能走路，只好返回家。正在想办法时，敌人已找上门来，将风扬抓走了。

风扬被捕后，我家父兄就把我看守起来，不让我出门，并告诉我今后不许到刘家去。然而，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挽救风扬同志

生命，我想方设法避开父兄的看管，去监狱探望他。后来，刘风扬被押送济南，他的处境更加恶化，为了能照料他、营救他，我毅然抛开了自己的家，来到了济南。在同学高振源的帮助下，我与地下党员孟光介同志取得了联系，决定设法营救风扬同志出狱。不幸的是，几天后孟光介同志也被捕，营救风扬同志更加困难。面对现实，我如同陷进万丈深渊，感到绝望。为了寻找机会营救风扬同志，我化名王国英，经人介绍到济南东门外给一隋姓教员家里做佣人。一边给人家做活，一边经常去狱中探望。谁知，在那种恶劣环境下，风扬在狱中害起病来。我既要照应他的生活，还要托人请医生给他治病。当时，到狱中探望就很不容易，何况还要请医生治病，其难度可想而知。幸亏风扬的同学姜玉斌（警察学校学生）从中帮助，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

旧社会的衙门易进而难出，国民党错抓人而不错放，何况风扬是被叛徒告密的共产党员。风扬同志在狱中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令人惨不忍睹。记得有一次我去探望他，只见他那两条腿肿得像碌碡，镣铐早已卡进肉里，双手焦黄，手掌墨黑，据说是被攥火球的惨刑烧伤的。他强作笑容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我发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呆滞了，说话已颤不成声。他低声对我说：“雷赤同志，人要有决心，有毅力，有志气，不屈不挠才能成功。现在你学医我赞成，在某处我还有几个药方挺灵验。”最后，他用极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你自己珍重吧！为着我们愿望的实现，事业的成功，你要顽强地活下去……父母面前你就替我问个好，捎个口信吧……”

第二天，当我又去看望他时，风扬同志已经离开了人间。风扬同志牺牲后，敌人不许入殓，多亏姜玉斌和他的姐夫纪广文二人从中做了周旋，才得以扶柩回胶县安葬。

处理完风扬的后事，我变成了亲友不靠、无家可归的孤女子，

亲戚朋友都不敢接近我。当时，真想一死了事，可想起风扬同志的嘱托和他那英勇的革命气概，又给了我活下来继续革命的勇气。但由于无处安身，只好在胶城南计斤庵落发为尼，成了出家人。

入庵不久，党组织便派人与我联系，但被师傅拒绝。后来，我跟着大师伯住在城里无梁殿。“七七”事变以后，王石民同志和我取得了联系。无梁殿就成了同志们进城活动的落脚点，我本人也成为党的联络员，曾一度被汉奸告密受审，在敌人威吓面前，我并没有屈服。1942年，王石民同志被捕牺牲，我又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64年1月

战时的机关生活

仲兆峰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8月，我地方党政机关撤出胶城，转移到冷家村、战家村、李子行、临洋、仇官寨一带活动。因为这个地带是龙山、艾山、临洋三区交界处，正是开展对敌游击战的好地方。

那时，党组织尚未公开，表面上是胶县县大队政治处（即县委），公开出面的是胶县县政府。政治处设有秘书处、组织部（部长陈屏）、宣传部（部长王冰）、武装部（部长于尚勤）。军队是县大队，王海亭兼任大队长，杨维屏任政委。这就是我们胶县的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各区都有区中队（连的编制），区长任中队长。

胶城区中队撤出后，在城南区王家庄、尹家店、一溜艾泊、马虎沟一带活动，后来编为城郊武工大队。是秋，我被调往县大队政治处宣传部任干事。从此，我跟着机关领导同志坚持对敌斗争，和村干部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支援和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

那时候，机关干部没有工资，只知道吃饱饭，喝足水，干好工作，根本不讲究穿戴。虽然吃的是地瓜饼子（玉米面）就咸菜头，小米干饭加韭菜，可心里非常满足。老百姓编的歌儿“土八路，三样宝，手枪、虱子、破棉袄……”又“游击战，麻雀战，敌人一听吓破胆”，就是对游击队伍的真实写照。

当时，机关内官兵一致如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向敌人作斗争。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穷苦老百姓，为着一个目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在一起工作。

我在去宣传部工作以前，曾跟着胶城区大同镇镇长管乐舟活动。他是城区中队大同分队（排级编制）的负责人。管镇长带领我们活动在王家庄、艾泊一带。当时，国民党军在双岭设有一个碉堡，驻有一个班的兵力，经常到各村骚扰百姓，抓小鸡，找女人，弄得百姓不得安宁。有一次，领导命令我和高义心、李凤堂三人去王家小庄，了解一下城里和双岭的敌情。走到村里，正好中午，我们就找村干部派中午饭，地点在村西的大树下。我们要的是地瓜饼子，可是一位大嫂却送来一份白面单饼和几个熟鸡蛋。我们感到不对劲，找村长一问，才知道村东头有还乡团，保长给他们派的是单饼、鸡蛋，共六份（当时近城几个村一般是两面行政。我们找村长，敌人找保长。有的村一个人应付两方面）。高义心说：“不用管，咱吃了再说。”吃完饭，我们往回走，到南沟沿上向还乡团吃饭的方向，打了两枪，扔了一颗手雷。敌人不知我们多少人，吓的撒腿窜回双岭。后来听说，有一个村民给还乡团送去一份地瓜饼子（应该给我们送的一份），挨了他们两耳光，幸亏我们打了两枪，把敌人吓跑了。

1947年夏天，镇公所住在孙家艾泊。一天晚上，接到紧急通知说有敌情，城里的敌人要来抢公粮，要求我们天亮前把尹家店的公粮转移到马虎沟村藏起来。此时，天降大雨，什么雨具都没有，管镇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夜间摸向尹家店，往返四五趟。崔炳杰副镇长个子大，一次能扛200斤。当时，我左脚背上生了个疮，穿不上鞋，就赤着一只脚，扛着百十斤的粮食，冒雨而行。结果，没到天明就把近两万斤小麦搬运到马虎沟藏起来。天刚亮，管镇长在孙家艾泊召开了一个大会，并宣布区委通知，给我们大同镇工作人员记集体三等功。大家虽然淋得像个落汤鸡，可心里却美滋滋的。

农历七月间，上级号召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坚持对敌斗争，迎接秋季的大反攻，因此我们城区的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分配到各区的联防武工队中去。我和匡吉华（女）分配到龙山区寺东联防区，迟廷章任组长。我们三人住在大周村北会子村。白天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和村干部、党员一起站岗放哨，监视敌人的活动。那时，敌人组织的拉驴队，夜间从大沽河东边过来，进村抢拉老百姓的牲口。特别狠毒的是还乡团中的“暗杀团”，夜间进村跳墙，专杀我们的干部、党员和贫苦农民。

一天夜间，迟廷章率民兵队长张尽法等人到村外活动，我和匡吉华在村里开会，发动群众备战和准备组织转移，因为我们得到情报敌人要下乡扫荡。上级通知：只要敌人没进村就要坚持斗争，不准离村。大约半夜以后，村东头场上响了一个手雷。我们忙去询问，站岗的民兵说：“东河底有敌人，是敌人扔来的手雷。”我们急忙组织去村东的场里，只见河底有人活动，我们就用手雷、土枪、石头，一齐向伏在河底的人影还击。驻寺东的县大队和住大周村的副区长董建祥都认为我村被敌人包围了。董区长还亲自带领通讯员和自卫团长张德玉向我村开了枪。蔡家沟村民兵也向我村方向点上了耳子炮。打了一阵子，伏在东河底的人高喊：不要打，是自己人。这才知道是迟组长用手雷试探站岗者。这一次浪费了不少弹药，被董区长狠狠批评一顿，幸亏夜里没有伤亡。

8月间，组织上调我到县委宣传部工作，驻冷家村。宣传部长王冰，通讯员小周，另有王殿英、郭盛熙、法笑斌、于文生和我，共7人。我们五个干事驻冷家村东西大街路南，白天以卖书（新华书店）为掩护。我和于文生搞通讯，跟领导一起活动；他们三人白天赶集，到王台、杜村一带了解敌人动态。表面上，天一黑我们就把门关上，老百姓以为我们睡觉了，其实，每晚9点之后，我们就爬墙出去，到曲家芦等村活动，了解敌情。盹极了，叫开老百姓的门休息一

会儿，再转移到另一个村。有时一夜要走三个村。拂晓前，我们又回到冷家村，越墙而进，天亮随百姓开门。群众认为我们开门营业，根本不知道我们夜里唱的是“空城计”。

县政府以王海亭为首的领导干部，也是游击睡觉，夜间在各村活动，到某村一躺就是休息，没有脱衣睡觉的。潘善国说，就怕夜间转移。他当时干文书，走到哪里用担子挑着油印机，比谁都累。幸亏他个高力大，有的是劲。

秋天豆叶黄了的时候，宣传部长王冰派我去前方，跟着政委杨维屏（县委书记）在肖家岭一带活动。一天，杨政委命令我准备宣传牌及宣传品。我和通讯员及两个战士一齐动手，用高粱秸和白纸做了20多个大宣传牌，上写“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类的标语口号，还准备了20多封劝降书，并把滨北专员王东年的布告做成大牌子，准备在夜间送到城里，把宣传牌插在城濠沟沿上，王东年的布告贴在城门上。一切准备就绪，一天夜里，杨政委通知各区中队、武工队，分路向胶城靠拢，把所有的宣传品按原定计划，插的插、贴的贴、撒的撒，两小时后全部完成任务。特别是爆炸队还在木牌底下埋上地雷。任务完成后，首先由火车站方向朝城墙上的敌人打排枪，这是信号，说明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接着城外的各方向都响起枪声，吓得国民党兵在城墙上乱成一团。顿时，敌人枪炮齐鸣，但不敢出城。我们却按时收兵撤退，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各自的设防地点。第二天，联络部的人员收集到这次大行动的效果。原来，敌人天明见城门上有告示，城濠沟上有大宣传牌，公路上有宣传单，气急败坏，忙令去掉，谁知一拔大牌子，下面的地雷开了花，被炸死炸伤很多。

有一次，武工队在肖家岭捉到一个“活舌头”（俘虏），经了解是胶城西乡丁官一带人。杨政委对他进行政策教育，并让我们用细粮做面条招待他。这个俘虏心悦诚服，表示回去一定做好事，并宣传

共产党的政策，放下武器，归降人民。最后，杨政委派了两名战士把他送出解放区。

战时的机关生活是流动的，一切为了战争的需要，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就是县级机关也全在群众家，炕上放上一张饭桌，上面铺上一张报纸，这就是办公桌。转移时，个人的行李用品用一根绳子，打起背包，背在身上。交通工具就是“11号”（两腿步行），有时机关东西拿不动，就用骡马驮。有时领导需要，也只是骑匹马。那时没有礼堂，县里开大会就在冷家村北面的大白果树下，没有扩音设备，领导讲话就只有放大嗓门，人多听不见，就站在大桌子上。碰上机关转移，可累坏了炊事员，锅、碗、瓢、盆全用扁担挑。然而，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

（阜安街道办事处文史组供稿）

1992年9月30日

回忆建国前的粮食工作

于式源

1948年初夏，我被分配到原胶河县桃园区做粮食工作，任粮库主任。当时，战火未熄，炮声时鸣，正处在新解放区不断扩大、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之际。粮食工作在确保军供民需方面，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事过虽已40年之久，但每当回忆起这段工作中亲历、亲见之事，仍记忆犹新。

在战争年代，粮食部门的设置很简单。当时这个粮库设在区公所驻地插旗崖村，只有主任、会计、出纳和两名办事员，却要担负全区近百万斤粮的收支、保管任务。为迎接夏粮的征收工作，上级部门要求我们在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尽量改善原有的仓储条件，以保证原存粮食不受损失，新征收的粮食妥善保管。

我们在滨北专署粮食局工作组的具体指导下，全面进行了原存粮食的大检查和夏粮收存仓储准备工作。由于战争形势所迫，在1948年前储存的粮食，除少量从本地征收之外，大部分是由高（密）诸（城）平原地区征运进来的。这些粮食大部分藏在深山小村，越是山沟小村就越存得多。当时没有条件专盖粮仓，大都借用常年失修的民房和未确权的公房，条件极为低劣。有的户三间房，东间住人，西间存粮；有的正房住人，厢房存粮。经过这次实地查仓，发现有的粮仓从四周漏出粮食，有鸡鸭围食的现象，有的因漏雨，粮

食霉烂成一根根硬柱子，有的大豆仓烂成一个蛋。我们在摸清仓储情况后，立即向领导作了全面汇报，经领导研究决定，立即动员全区存粮村庄的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抓住好天气，进行粮食大曝晒。经过 10 多天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经核实，仅小麦一项就霉烂变质近 10 万斤，随后将霉烂粮食分配到各村，作了救灾处理。

在为夏粮征收作准备的同时，我们接到上级的紧急指示：要在两个夜晚，由我区调运出 20 万斤粮食。除本地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参加运送外，大部分是外地民工。因山区小道，又加晚上行动（白天防空），更加大了运输难度。本地男女青壮年全部参加运粮工作，除肩挑人抬、牲口驮外，还要在险要路段帮助外地民工拉小车、照明，连识字班、儿童团也提灯照明，引路出山。全部粮食运集到西南角大道旁，准备由机动车辆、大马车往西南方向运去。在这次运粮活动中，我们粮库的全体同志都昼夜不停地发粮食，晚间开仓发运，白天过秤办好手续，以备晚间运走。为了完成任务，及时支援前方，粮库人员两天两夜不得安睡，都不顾疲劳，积极工作，直到善始善终地完成任

在完成这次大外调任务后，对原有仓房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修缮，给夏粮及时入库打下了较好的仓储基础。接着夏粮征收工作开始了。当时因连年战争，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几乎全部投入了大支前，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使这年的夏粮收成不好。为此，上级部门号召搞好生产自救，节约粮食，支援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既抓好夏粮征收，又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安排好群众生产。为确保夏征任务的完成，区里根据上级指示，抽调大批助征人员，进行了专门训练，对各村上报的材料数字要进行逐户审核计算，经审核无误，上报批准后才能组织入库。由于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群众的交粮热情非常高涨，有

不少村子组成交粮队，敲锣打鼓，高喊口号，送交翻身粮、解放粮，全区的夏粮征收工作又快又好地完成了。最后，对少数的欠粮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减免、缓征处理。

由于粮食的歉收，灾荒仍在继续，上级部门号召全体干部职工同群众一起搞好生产自救，争取秋季的大丰收。当时机关人员都普遍实行每日两餐制。最艰苦时，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粮。在吃饭时，每人分二两小馒头或小饼子，其余光喝稀饭。当时有个顺口溜“不分小人大汉，病号饭四两面，够不够的这些饭。”为减轻群众负担，上级一再号召：机关人员的供应，一律实行自磨自食自搬运的制度。为此，机关人员都轮流搬运粮草，加工成品粮。

由于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形势逐渐好转，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使这年秋粮获得了大丰收。为确保秋粮征收顺利完成，上级部门在抓好统一布署的同时，派出了若干工作组深入农村，指导帮助完成秋粮征收工作。根据秋粮数量大、粮色杂的特点，在征收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记得顺利完成秋粮征收任务后，还多收了大量的花生米。有的人在送交籽粒饱满的花生米时，高兴得大声讲：“这都是一级花生米，一定是支援苏联老大哥的……”花生米征收完毕，我们又进行了精选装袋，最后全部北运。

这年秋收结束后，粮库工作大部分时间放在成品的加工和烧柴、马草的支付外运上。

1949年春，我被调到胶河县（驻铺集）粮食局工作，正碰上一次成品粮的紧急北调任务。当时绝大部分粮食都分存南边的几个山区内，由于承运量大，时间短，要求严，从而加大了调运工作难度。在粮食系统人员共同努力和各区领导的有力支援下，迅速展开了全民性成品粮的加工运动。当时没有机动面粉厂，全靠石碾、石磨，人推畜拉进行加工。有的村没有碾，除了用旧法白米外，只好到外村借用石碾。在成品粮的收交过程中，对质量标准的要求非常严